

中国服装色彩的文化共性

郑巨欣

(中国美术学院 手工艺术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12)

摘要:中国服装色彩有鲜明的特色,研究有诸多路径,文化共性研究是重要选项。通过分析中国色彩的颜色观,试图说明其与当下中国通行的西方色彩学之间的不同,指出系统性的中国服装色彩文化受到中国历史、地理、语言、制度及其相关的色彩文化的滋养,并首次提出中国服装色彩文化共性的整体观,认为中国服装色彩研究需要注重内化颜色与外观物色的统一。

关键词: 色彩; 服装; 中国颜色; 文化共性

中图分类号: TS 941.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6-1928(2025)01-0059-05

Cultural Commonality of Chinese Clothing Colors

ZHENG Juxin

(College of Manual Arts, China Academy of Art, Hangzhou 310012, China)

Abstract: Chinese clothing has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one of which is color. There are multiple approaches to studying clothing colors, and more research is needed on the cultural commonalities of clothing colors. This paper aims to illustrat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raditional Chinese color concepts and the currently prevalent Western color theory in China by analyzing the perspective on color in Chinese culture. It emphasizes that systematic research on Chinese clothing colors should be nourished by China's history, geography, language, and institutions, as well as the related color culture. The paper proposes an integrated perspective on the cultural commonalities of Chinese clothing colors, suggesting that research on Chinese clothing colors should focus on the harmony between internal color perception and external color expression.

Key words: color, clothing, Chinese color, cultural commonality

多数研究中国服装色彩的学者都希望从服饰中发现各种色彩现象,包括自然与人文色彩,这种倾向往往导致其关注点过于集中在服装色彩的表面和个案特征,而忽略色彩文化的整体背景和文化心理。换句话说,很多人倾向认为中国色彩文化的独特性主要体现在服装色彩的物理元素上,从而忽略了中国服装色彩实际上是中国历史、地理、语言、制度以及相关文化资源与人类感知共同作用的结果,即中国服装色彩有其独特的生成环境。在使用色彩语言分析方面,目前西学的色彩理念,如色彩三要素和光谱原理等,主导了中国服装色彩的研究语境。笔者并不反对使用西方的色彩理论,其有一

定的科学性,但西方色彩理论与中国色彩文化是两个不同的体系,两者研究背景、研究者认知和研究目标不同。西学色彩主要研究色彩在自然与技术层的特性和应用,更偏向实用性和应用性;而中国色彩研究则侧重色彩的文化内涵和历史语境,关注文化价值取向和资源的再挖掘。现代研究者既要重视西方色彩理论在中国的应用研究,也要关注中国色彩文化的研究,促进两者之间的交流与互补。比较而言,从中国服装色彩文化的整体出发,发现和发展中国服装色彩的特色,不仅符合事实规律,还有助于增强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自信,更好地服务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收稿日期: 2024-08-08; 修订日期: 2024-12-21。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2VJXT004)。

作者简介: 郑巨欣(1964—),男,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传统工艺与文化遗产。Email: 1549398077@qq.com

1 中国服装色彩的颜色观和色彩观

尽管在现代汉语中,“颜色”和“色彩”有很多交集,但它们在内涵和外延上有所不同,不能将其简单等同,文中从汉字的特点和演变进行分析。

1.1 从汉字的特点看“颜色”

中国汉字为单音节,一字一义,二字组词往往有双重含义,该特点影响了中国色彩文化的理解方向。关于“颜色”的本义,《说文解字》中解释“色”为“颜气也,从人、从卪。凡色之属皆从色”。“色”代表的是内心状态通过气色表达出来,“颜”则指气色的表现。“颜”和“色”的取义不同,而解释“颜色”还需从“色”开始。因此,“颜色”在古代更多地用来描述人的气色和神态,如《论语·为政》中的:“色难”;《论语·泰伯》中的:“正颜色,斯近信矣”;《荀子·劝学》:“不观气色而言”;《管子·心术下》:“可知于颜色”。这一解释与《现代汉语大词典》中“颜色”指代“脸色、面容”的含义一致。但解释为“颜气”可能并不是“色”的原始意义,而是后续的演绎。“色”的初义可能与两性关系有关,代表的是性欲或男女之交媾。如日本学者笠原仲二^[1]认为,色之美生于视觉和触觉感知,女色是感知之源。把“色”的本义,看作是“男女之交媾”,或者由此引申为“性欲”是适当的。由于女性的气色往往被认为是美的,因此“颜色”逐渐被用来描述人的气色,进一步扩展到人的精神面貌和社会关系。

此外,“颜色”还关联到中国人的礼仪文明,《说文解字》中“色从卪”。“卪”指圭玉,是诚信的象征,也是代表人与人交往的根本。在中国人的观念里,人是否真诚可信,是可从其神气、举止、穿戴看出来的。可见“颜色”是由人及物,涉及穿戴和处事得体方面的考量。《礼记·冠礼》中记载:“礼仪之始,在于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礼记·玉藻》也提到:“凡祭,容貌颜色,如祭所见者。”汉代人们认为这些关乎服装颜色之礼节始于西周,因此中国服装色彩的传统实际上是颜色仪礼的传统。礼仪的目的在于融洽人际关系。如在祭祀场合,必须端正容颜,以保持庄严的仪态。而在社会中,人是否端庄,往往通过他人的观察来评价。如《墨子·尚贤中》中的“不嬖颜色”,《荀子·非相》中的“相人之形状颜色”,《孔子家语·曲礼子夏问》中的“颜色称情,威容称服”。这些例子表明,颜色不仅用于观察人的外貌,还是判断人的品性、吉凶祸福,以及权衡人际关系的依据。

1.2 “颜色”“色采”字义的演变

直到战国中期,“颜色”才开始有类似于现代“色彩”的用法。大约在东汉以后,汉语里出现了与现代“色彩”一词意思比较接近的“色采”,如《尚书》中提到:“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并进一步说明:“采者,青黄赤白黑也;色者,言施于缁帛也。”以及《后汉书·舆服志》里有“采十二色”“采九色”“色采”等,其中“采”有的作动词,有的作名词。“采”的古字形像用手摘取树上的果实或树叶,其本义为摘取,引申为搜集、选择、采纳、取得等义。因此,“色采”属于动宾结构,可以理解为通过“采”而获得颜色,多“采”则多彩,这种结构反映出了中国人对获取颜色途径的原始认识。至宋代,《集韵》中有:“彩,通作采”的记载,表明“彩”和“采”是可以通用的,可知此时已经可以将“色采”和“色彩”等同。

词语的演变也有其渐进的过程,一个词的出现和消隐都不是兴于一时而改于一时,也不是只限于使用一个相同的词。“采色”一词的动宾结构在东汉以后仍然被使用,如《文选·司马相如·封禅文》中的:“采色炫耀,焕炳辉煌”。同时,主谓关系的“色采”自汉代以后也一直沿用,如元代吴莱(1297—1340年)《严陵应仲章自杭寄书至赋此答之》中的“色采黄金黻,音声征角韶。”此外,一些色彩词尽管用意是“采色”,但仍写作“颜色”的也比较普遍。如晚明谢肇淛《五杂俎》中提到:“陶器,柴窑最古……世传柴世宗时烧造,所司请其色。御批云:‘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做将来。’”这表明即使在“色采”已经出现的情况下,但按照古人汉语表达的习惯,仍常使用“颜色”一词。

虽然“色采”在词组结构方面与“色彩”相同,但其在中华文化里的存在和表达方式仍然属于“颜色”的认知范畴,与现代汉语里对译英语“colour”的“色彩”一词有显著不同。现代汉语的“色彩”概念,一般被理解为人类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通过获得色觉并将其嵌入基因,从而识别和感知色彩。该过程对人类站在地球食物链顶端,实现文明的繁荣起到了重要作用。人类基于红色、绿色和蓝色视觉三原色,感知五彩斑斓的色彩世界;通过辨别颜色,掌握了丰富驳杂且灿烂多彩的颜色属性,孕育了色彩艺术,形成了文明,获得了文化繁荣。在现代色彩沟通中,人们将语言作为最重要的交流工具,以应对逻辑性问题,但色彩是基于感性的表现,无法进行客观的测量,因此以颜色样本(色卡)的形式来表示颜色,并组合颜色名称来匹配语言,提高色彩沟

通的精确度^[2],从而更好地传达色彩信息。而古代中国,人们对色彩的表达更多针对人的气色、精神面貌和礼仪。

总之,“颜色”和“色彩”在古代中国和现代汉语中有着不同的使用背景和含义。古代的“颜色”多从人本出发,描述人的气色和精神面貌,并与礼仪密切相关。现代的“色彩”则从物本出发,描述物体的颜色,并通过科学手段和语言逻辑来提高沟通的精确度。

2 服装色彩的中国文化共筑

中国古代使用“颜色”“采色”或“色采”,这一现象与中国特殊的地理环境、民族性格和文化价值观密切相关。文化是复杂且动态发展的综合体,总是在某种自变量(independent variable)和因变量(dependent variable)的交互作用中演变。自变量取决于相关者的选择、控制、研究,其独立变化会成为影响或引起其他变量变化的条件或因素;因变量是指目标变量,其变化不但可以被观测,还能随着自变量的变化而变化。除了自变量和因变量发挥着规定性的影响之外,还有一种叫额外变量(extra-neous variable)。额外变量也叫控制变量,是指除了自变量以外的影响变化和结果的潜在条件或因素,也会导致文化异常等,如不可确定、不可预测性的气候、地理、族群因素。

中国东临茫茫沧海,西北横亘漫漫戈壁,西南耸立巍巍高原,这种半封闭的地理环境,建构了一个内部回旋文化系统,使中国文化的自变量具有独特的色彩调性。古代中国服装的染色材料以植物为主,如《唐六典》载:“凡染大抵以草木而成,有以花叶,有以茎、实,有以根、皮,出有方土,采以时月,皆率其属而修其职。”^[3]然而,即使是相同的植物,因产地不同,所染的色泽也会有所差异。以茜草为例,在相同的染色工艺条件下,西洋茜(产于波斯、印度)可以染出非常浓艳的红色,而东洋茜(产于中国、日本)则能染出略带橙色的红色,这种差异非人为,而是由地理环境影响下的植物特性决定的,但是因中国人长期使用本土植物染色的色彩,就会在其心理和视觉审美上产生相应的影响。

中国的服装色彩一直辅助或追随着中国政治。周代的五色系统就是通过“五德始终说”来服务政治建构的。据甲骨卜辞、《尚书》等记载,五德始终说起源于殷周的五行说,五行指构成万物的五种元素,即木、火、土、金、水,对应色彩分别是青、赤、黄、白、黑。《尚书·益稷》载:“帝曰:予欲观古人之象,

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会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绣,以五彩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基于此,构建了服装色彩的等级文化。

中国色彩文化包含了有关国家地理空间描述的联想性特征,如殷周到秦汉的色彩体系是五方和五色结合,五色和服色结合。根据《逸周书》记载:“诸受命于周,乃建大社于周中。其隤东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骊土,中央叠以黄土。”又“五行:一黑,位水;二赤,位火;三苍,位木;四白,位金;五黄,位土。”^[4]这种五方和五色结合,不仅是对地理空间的描述,还反映了自然法则。《周礼·考工记》进一步记载:“画、绩之事杂五色。东方谓之青,南方谓之赤,西方谓之白,北方谓之黑,天谓之玄,地谓之黄。青与白相次也,赤与黑相次也,玄与黄相次也。”^[5]这种五方五色和服色的结合,体现了中国人对自然的敬畏和顺应,并进一步强化了服装色彩的象征性。

置于世界历史和环境 中,区域文化的独特性会更加清楚。中国先秦时期的地理位置与西欧古希腊相近,但东西方的地理和文化差异显著。中国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其以农耕为主的生产方式,进而塑造了中国人的主体身份。农业的春播秋收,周而复始,生成了中国人顺应自然、依赖自然的文化特征,形成了强烈的家族和乡土意识,进而发展出内向思考的本能。相比之下,以古希腊为代表的西欧地区,由于其地理位置遍布众多海岛,环绕着地中海,当地居民的生活深受海洋冒险精神的影响。这种地理环境孕育了他们改造自然的实践精神,并塑造了与自然抗争的文化倾向。因此,西方的服装色彩通常更为热烈明快,而中国的服装色彩则总体上偏向于内敛和协调,其审美取向受到对文化地理的认同影响。换言之,中国的地理环境决定了服装色彩的中国文化共性。

3 中国服装色彩文化共塑

虽然“文化”一词是一个复杂且不断被人们重新定义的词,但文化的基本结构相对稳定,主要包括物质、制度、精神 3 部分,其中的物质处于文化的表层、制度处于文化的中层、精神处于文化的深层。中国服装色彩不仅反映了社会的文治教化,还与文字运用等多方面因素相互渗透,与知识、信仰、艺术、风俗等相协调,构成了共性的色彩文化。

中国服装色彩的物质性特征以其所见所得,发挥着被人感知的视觉文化作用。服装色彩的呈现依赖染色,而染色则与染材、工艺、季节密切相关。

以唐代染蓝为例,文献的记载有 3 种:菰蓝、木蓝和蓼蓝。《新修本草》中提到:“菰蓝为淀,惟堪染青,其蓼蓝不堪为淀,惟作碧色尔。”^[6] 菰蓝通过碱水浸泡获取靛质,蓼蓝则通过浸揉生蓝叶产生碧绿色。浸揉对植物中含蓝靛成分要求较高,蓼蓝开花之后,叶子色素骤减,因此生鲜蓝叶染色宜在其每年开花前的六、七月进行^[7]。这些细节说明,服装色彩的流行不仅受社会驱动,还与染色季节有关。与此同时,生鲜蓝叶产生碧绿色,对色彩语言也会产生影响,在中国古代,蓝色和绿色的词语常常互换使用或与此相关亦未可知。

色名与物色互为关联,但在大多情况下,人们对色彩的讨论只停留在语言文字上。有学者曾系统整理过《说文解字》(汉代)、《碎金》(元代)、《天工开物》(明代)、《扬州画舫录》(清代)、《布经》(清代)、《雪宦绣谱》(清末民国初)中出现的红、黄、紫、褐、青、绿、黑、白等与纺织服装相关的色彩词,并根据词频得出汉代用红色的色名较多,元代用褐色色名较多,以及明清较多使用青、蓝、绿、黄等色彩词的结论^[8-10]。该结论至少说明了历代服装色彩表现在语言文字上的流行趋势。其他如《韩非子·外储说左下》:“齐桓公好服紫,一国尽服紫”^[8],唐代郑谷《锦》:“布素豪家定不看,若无花彩入时难”等描写的也是服装流行色,但更加具体且具有时效性。由此说明,作为物质文化的服装色彩流行体系,既存在于色名,也包含物色,它们共同受到社会时尚的驱动。

服装色彩的制度性特征体现在国家和社会对服装色彩的规范上,其在社会组织里起着标识、塑造、稳定和指导个人、团体和社区行为的作用,从而使互动中的其他参与者能够预期或预见自己行为的结果。自先秦时代,中国就有“以八则治都鄙”的国家制度和约定俗成的民间礼俗。《春秋左传·昭公二十五年》指出:“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生其六气,用其五行,气为五味,发为五色,章为五声。淫则混乱,民失其性。是故为礼以奉之……为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11]表明服装的花纹和颜色是“礼”的重要内容。为了符合“礼”的要求,古代中国对染色、画绘的匠人,以及人们的用色行为制定了严格的规则。如《仪礼·士冠礼》中提到:“皮弁,服素积,缁带。素鞶。”郑注:“皮弁者,以白鹿皮为冠,象上古也。”有学者对甲骨文中出现的“白”字研究发现,商代的白色动物在祭祀和占卜中占有重要地位。此与《史记》记载:“汤乃改正朔,易服色,上白,朝会以昼”相印证。上白,

即崇尚白色。还有学者证明,殷人的这一风尚,对秦国文化有很深的影响^[12]。

汉代继承秦制,进一步细化中国的服装色彩制度。《后汉书》详细记录了不同社会阶层的服装色彩规定,例如:“公主、贵人、妃以上,嫁娶得服锦绮罗縠缯,采十二色,重缘袍。特进、列侯以上锦缯,采十二色。六百石以上重练,采九色,禁丹紫绀。三百石以上五色采,青绛黄红绿。二百石以上四采,青黄红绿。贾人,绀缥而已。”^[13]《旧唐书》中也有类似的规定:“旗帜皆从金色,饰之以紫,画以杂文。八品以下旧服者,并改以碧。”^[14]

精神文化主要来自人的心理表现,是最为内在、隐蔽、微妙和广泛的文化表达形式,象征性色彩通过具体的颜色暗示特定的人物或事理,传达真挚的感情和深刻的寓意。如清代在象征“江山永固,社稷长存”的社稷坛面上铺五色土,分别为中黄、东青、南红、西白、北黑,以五行学说中的五色对应五方。象征色萌芽于甲骨卜辞,成文于《尚书》《逸周书》,并基于阴阳五行说产生正色和间色的象征意义,又经邹衍的“五德终始”说演绎,贯穿成为国家兴替的政治历史观,成为政治的工具。

官方的服装用色多以正色、间色严格区分尊卑,如《礼记·玉藻》所载:“士不衣织,无君者不二采,衣正色,裳间色。非列采不入公门。”^[15]郑玄注解:“谓冕服玄上纁下”,即冕服上衣为黑色,下裳为赤黄色。孔颖达进一步解释:“玄是天色,故为正;纁是地色,赤黄之杂,故为间色。”又引皇氏云:“正谓青、赤、黄、白、黑,五方之色,不正谓五方间色也,绿、红、碧、紫、駟黄是也。”^[15]《礼记》中提到:“玄冠朱组纓,天子之冠也,缁布冠纁纁,诸侯之冠也,玄冠丹组纓,诸侯之齐(祭)冠也,玄冠綦组纓,士之齐冠也。”^[15]这些用色规定既是制度性的,更是作为上可兼下,下不可僭上的象征,发挥震慑性的阶级统治作用。

民间的服装用色多以正色、间色来区分贵贱。例如,《诗·邶风·绿衣》载:“绿兮衣兮,绿衣黄里。心之忧矣,曷维其已。绿兮衣兮,绿衣黄裳。心之忧矣,曷维其亡。”《诗序》解作:“卫庄姜伤己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诗也。”^[16-17]朱熹注:“间色贱而以为衣,正色贵而以为里,言皆失其所也。”注又曰:“庄公惑于嬖妾。夫人庄姜贤而失位。故作此诗。言绿衣黄里,以比贱妾尊显,而正嫡幽微。使我忧之,不能自己也。”这里的“绿衣黄里”是说里子用正色(黄色),衣用间色(绿色),就好像颠倒了贵夫人和贱妾的地位。而“绿衣黄裳”是说上衣用

间色,下裳用正色,上下颠倒,比里外不分更加过分。可见“黄”“绿”二色不只用来说明衣、裳的颜色,更是借其表明身份的贵贱差别。

总之,中国服装色彩的象征性已经成为中国的文化符号,深深烙印在中国人的记忆中。例如,黄色代表帝王,朱、紫、青、绿代表不同的官阶,赫色则代表囚犯。这些色彩不仅是颜色的象征,更是社会地位和身份的体现,已经深深地烙印在中国人的记忆里,同时也成了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服装色彩文化印象。

4 结 语

基于对中国服装色彩文化共性相关文献的梳理,得出以下 4 点结论。

1)中国服装色彩源于中国人的颜色观。中国人的颜色观不仅是对视觉色彩的感知,还包含更深层次的文化内涵。颜色的本意是眉宇之间的气色,“颜”和“色”二字的组合反映了颜色观的不同维度。“颜”泛指颜面、面子,而“色”则从眉宇之间的关系,发展到人与社会习俗、政治礼制之间关系。在价值、时间、方法和空间维度的延展下,形成了区别于西方色彩体系的中国颜色体系。因此,中国服装色彩的逻辑起点是人本身,且采取的是由内而外、由人及物的整体取象方式。

2)中国服装色彩在中国色彩文化体系中的重要作用。中国服装色彩融合在中国色彩文化的共性之中,并在两个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①在古代发挥了构建阶级统治秩序的作用。色谱在中国社会政治制度中发挥了辅助作用。如“以五彩彰施于五色作服”等规定,通过颜色区分社会阶层,构建了牢固的阶级统治模式。中国的色谱在周代已见端倪,到秦汉时代扩展到二十多种颜色,但描述方式,有别于现代西方色彩的光谱分析,更侧重于以物比物的表现方式。②色彩流行体系的形成。中国自古就有服装色彩的流行体系,基于对传统色彩语言的总结,发现该色彩体系呈现出从暖色调向冷色调演变的规律,不仅体现了社会的变化,还反映了不同时代的审美情趣,即将社会思潮表现为具体颜色的时尚动态。

3)中国服装色彩的搭配与文化联想。中国服装色彩的搭配方式不限于物质形态的所见所得,还借助中国人在文化方面的联想,构成与宇宙万物相

统一的色彩世界。这种联想以象征性为媒介,可以从一个有限对象衍生出无限连续对象。它意味着中国丰富多样的民族服装色彩形成了一个中华服装色彩的文化共同体,是民族文化记忆中不可替代的色彩文化基因。

4)中国颜色文化和西方色彩学的差异。中国的颜色文化和西方的色彩学分属于两个色彩系统。中国颜色文化更加整体,西方色彩学更加系统;中国的颜色文化更加倾向于色彩的文化性表达,而西方的色彩学更加倾向于色彩的物理性分析。中国人谈论色彩的语言文字具有较大的包容性,能够与客观色彩通约,且这种文化根深蒂固,使得内在的主观色彩图景与外在的物质色彩相统一,中国服装色彩研究也是如此。

参考文献:

[1] 笠原仲二. 古代中国人的美意识[M]. 杨若薇,译. 上海:三联书店出版,1988.

[2] 永田泰弘. 新版色の手帖[M]. 东京:小学馆,2002.

[3] 李林甫. 唐六典[M]. 陈仲夫,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1992.

[4] 黄怀信. 逸周书校补注译[M]. 修订本. 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

[5] 冬官·考工记[M]//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卷 40. 影印本. 北京:中华书局,1980.

[6] 苏敬. 唐·新修本草:辑复本[M]. 尚志钧,辑校. 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

[7] 郑巨欣. 传统蓝染的植物和染法及其工艺简史[J]. 丝绸, 2024, 61 (1): 109-119.

ZHENG Juxin. Traditional indigo-dyed plants and dyeing methods and the craft history[J]. Journal of Silk, 2024, 61 (1): 109-119. (in Chinese)

[8] 梁文昱. 《元史·舆服志》色彩词频探析[J]. 流行色, 2020 (8): 29-33.

LIANG Wenyu. An analysis of the frequent color words in *History of Yuan Dynasty · Yufuzhi* [J]. Fashion Color, 2020 (8): 29-33. (in Chinese)

[9] 危丽娟. 《说文解字》颜色词疏解[D]. 西宁:青海师范大学,2018.

[10] 李斌. 清代染织专著《布经》考[J]. 东南文化,1991 (1): 79-86.

LI Bin. A study of the Qing Dynasty's dyeing and weaving monograph *The Fabric Classic* [J]. Southeast Culture, 1991 (1): 79-86.

[11] 杨伯峻. 春秋左传注(四)[M]. 北京:中华书局,1981.

[12] 牛克诚,孔德平. 中国传统色彩研究[M].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22.

[13] 范晔. 后汉书[M]. 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

[14] 刘昉. 旧唐书[M]. 北京:中华书局,2014.

[15] 十三经注疏[M].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

[16] 金启华. 诗经鉴赏辞典[M].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0.

[17] 黄典诚. 诗经通译新铨[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责任编辑:卢杰)